

陈国瑾

陈国瑾，又名陈明，绰号胡须陈、陈老区。1926年2月15日出生在原合浦县寨圩乡永背村一个已经破落了的簪缨世胄的书香之家。七岁破蒙入学读书，学业成绩较好。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原合浦简易师范学校进步师生的带动下，他积极参加了当时寨圩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和领导了一支少年抗日先锋队，利用节、假日下乡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939年秋，他考进了设在寨圩的合浦简师读书，受到了党的教育和革命的熏陶，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投身到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当时合浦简师的反汪学潮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学校党组织遭受了破坏，因而一时顾不上将其吸收到党内来。1941年下半年，中共寨圩区委决定在合浦简师重新建党时，才于十月份将其吸收入党，重新建立了学校党支部，由陈国瑾同志担任支部书记，继续领导简师的地下革命活动。

1943年7月，陈国瑾在简师毕业，开始在社会上谋职业。他通过同学关系，到了新睦乡白花村的十五保校任教，在那里掩蔽活动。1944年秋，又转到乐民乡凤池小学任教，开展地下活动。

1945年元月，寨圩地下党正在贯彻中共南路特委关于在南路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着手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此时，陈国瑾奉召转返寨圩，同黎中昌、朱棣照等同志一起，开展了武装起义的组织活动。农历正月十五夜，当组织起来的起义队伍于六鸦、脚儿埭两村集结待命，准备举义之时，领导上临时改变计划，命将已集结的队伍分散掩蔽待命，因此起义不成。结果陈国瑾等五位同志，被合浦县伪县长丘桂兴下令进行通缉。正在此时，寨圩地下党负责人劳锦动摇逃跑，黎中昌同志又转移到南宁去掩蔽。在这个既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情况又十分恶化的处境下，陈国瑾和分散掩蔽“待命”的朱棣照、李宪章、韦良善、朱叙初等几位地下党员联络起来，组成了临时党小组，由朱棣照同志担任组长，继续领导着寨圩的地下革命活动。

1946年夏，上级党组织派陈符隆同志到小江、寨圩担任该两地区的特派员后，命陈国瑾在寨圩街上同朱叙初同志共同开设的车缝店——“轰店”，建立地下交通站，作为沟通合浦与灵山之间的中转站，由他担任站长，兼管寨圩地区的地下党工作。

1947年春，陈国瑾奉命率领寨圩地区一部分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人员到武装部队去参加武装斗争，经受锻炼。寨圩“轰店”地下交通站交由朱叙初同志负责。同年夏，党组织决定在寨圩再次组织武装起义，把陈国瑾连同其率领到部队的原班人马一起调返寨圩，开展武装起义的组织活动。当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而尚未就绪之时，突然发生了六毕山塘事件（因小江地下党和游击队领导人之一的冯日升同志在率领几名战士到寨圩，取一挺交由寨圩地下党购买的轻机枪时，被反动派发现，而于六毕山塘发

生战斗，冯日升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陈国瑾和朱棣照等同志被迫撤退到农村中隐蔽活动。紧接着，又接连发生了龙胆和六斗事件，从部队调返的韦志钦、宁秀林两位同志被捕遭杀害。陈国瑾、朱棣照、李达贵等几位同志再次被国民党反动派下令通缉，整个寨圩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陈国瑾于此时调去部队工作，转战于小江、合灵边、横南等地。

1947年底，陈国瑾随十八团从横县转返合灵边时，奉命到该团的独立连任副政治指导员，和新调任的连长梁日安一起，共同做好连队工作后，又奉命按照领导的“挺进六万大山，开辟和建立六万山根据地”的部署，和蒙英翰同志于1948年春节后转返寨圩，迅速把寨圩地区的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后，于五月间建立了党的总支部(后改建为区委，归属灵山县工委领导)，由蒙英翰同志担任书记，陈国瑾同志为委员。并开展了武工队活动，来回活动于寨圩、乐民、土东等乡村，并迅速扩展到横县的马山、贵县的木梓、兴业县的仁厚、博白县的大寒等边界毗邻乡村中去，工作大有起色。同年秋，陈国瑾又受命根据中共广西省工委1947年4月横县会议关于把桂中南划归广东南路领导的决定，前往贵县木格、瓦塘、香江一带，通过吴佳诏同志，联系接收1945年春桂东南武装起义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同志，审查恢复了他们的组织关系，重新建立党组织，继续开展地下活动，使该地区重新在党的领导下，很快开拓了新的局面。到1949年春，以寨圩地区为中心，包括灵山、横县、贵县、兴业、博白等五县边界地区群众已经基本组织了起来，并发展扩大了党的组织，组建了武工队和民兵队伍，此时，六万山根据地区初具规模了。

1949年“八一”建军节，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纵队第四支队后，蒙英翰同志被任命为四支十二团团长，其区委书记职务由陈国瑾接任。在他主持区委工作期间，由区委抽调、组织了一批地下工作人员、民兵、和知识青年、社会青年共数百人，由陈国瑾率领，输送到四支十二团去。同时，着手组织区中队，准备解放家乡，接收伪政权，和布署支前，迎接南下解放大军等工作。1949年12月4日，南下解放大军刚过境时，终于由区委率领区中队解放了家乡，建立了人民的区、乡、村政权。

解放后，该地区建制为灵山县合北特区，陈国瑾同志继续担任区委书记职务。该区于1950年4月归制合浦后，成为合浦县第八区，其又继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在此期间，他在平定边界地方匪乱，领导群众清匪反霸和建设区、乡、村政权等工作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1年4月间，陈国瑾调合浦县中北区临时办事处任文教科长，七月调广西省委党校学习，十月编入省土改队，先后到陆川、东兰两县搞土改，完成土改工作后，留在百色地区工作。他在百色地区工作时间长达二十年之久，先后担任东兰县政府秘书，地委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共巴马县委副书记，中共隆林县委书记处书

记等职务。

十年浩劫期间，陈国瑾被诬以“叛徒”、“假党员”、“反共救国军副政委”等莫须有罪名，对其施以戴高帽、挂黑牌揪斗、抄家，还将其非刑捆绑吊打，投进机关监狱监禁，“劳改”达六年之久，使其身心备受摧残。直到1974年才草草宣布其无事释放出来，胡乱安排到地区土产公司任副经理。打倒“四人帮”以后，他毅然打报告请调离百色地区，1978年获准调到自治区科委办公室任调研组长。1979年10月，调任广西海洋研究所负责全面工作的第一副所长兼所的党支部书记至现在。

目前陈国瑾同志已年近六十，已经交班让贤，退居二线，但仍应中共浦北县委之邀，协助处理地下党遗留问题。他在垂暮之年，还为浦北地下党彻底平反、恢复其光辉形象而献出余热。

余新慈（自传）

我原名余带娣（余蒂），1910年出生于广东开平赤坎北炎。我祖父、祖母早年双亡，伯父因家贫没有念过书，我父亲聪明，也识得字，会写信，后来得到亲属资助到加拿大去打工，由于勤俭几年后积了钱回国娶了我妈妈，初生哥哥，后来生我娣，我和弟弟。弟弟出生那年，庶母生了个妹妹。那时在家六口人全靠父亲寄钱回来生活，每年秋后余些谷子储备做口粮，母亲种些杂粮和蔬菜，买些咸菜，过着清淡的日子。

我十一岁才开始读私塾，两年后转学到圩镇教会办的小学，在校寄宿。老师受“五四”运动思想影响对学生灌输了不少革命思想，如读书救国，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还教我们演戏，演讲，锻炼意志。我在那时就敢把辫子剪掉了。

1925年，父亲在广州买了房子，全家除了妈妈和嫂子在乡下故居外都迁往广州。家里经济大权全操在庶母手里，母亲无从过问。父亲也不再渡洋，住在广州靠买卖房产起家。庶母后来又生了个弟弟和四个妹妹，这时全家的生活来源靠收房租维持，弟弟妹妹都读上大学。有个姐姐、妹妹还到日本去留学。我高中毕业了，离家去教书，后来白天教书晚上读大学，得了一张证书。我教学所得，全盘给庶母收存，后来才知上了当。——过去不问政治，顺从父母主意。

1937年芦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当时，进步书刊公开发行，我开始读到《世界知识语丝》等进步刊物，对我思想上有了启发，从此我离开家门走向社会，参加进步团体组织。当时广州有抗日教育实践社的启蒙活动，学习唱歌和国语拼音等，遇到名人演讲，也争取去听，如爱国的七君子邹韬奋、沈钧儒等来广州讲学，对我也有启发。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上海、广州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从城市走向农村做救亡工作。1938年春，我和我的弟弟余新标（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办学，他任小学校长，

聘请了从上海、广州回来的知识界人士任教师，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在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如教抗会，抗先队，妇抗会，青抗队……我积极参加妇抗会，演戏宣传，募捐慰劳。在党的培养下，我1939年夏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调到湛江。同年夏天随海南难民撤退到高州，组织难民成立各种合作社，解决难胞生活。我是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粤南事务所工作。张进煊同志当时是党的负责人，经常和我接触联系。后来有了感情便和他结了婚。1942年我又调往湛江教书，是年，夏天生了个女孩，我的主要任务是掩护爱人搞好社会关系。1943年春和爱人回合浦，接着湛江沦陷了，我们就在白沙乡住下做农村工作。因为爱人有病在家休养，故他对我帮助教育不少。他的阶级立场坚定，经常教育我要和家庭划清界线，所以父母亲逝世，我也没有奔丧守孝。

1944年8月我在白沙产了个男孩（即绍城），孩子出生后五个月，我响应党的号召带着他参加合浦武装起义。那是春节前几天我由木岩塘出发。天下着蒙蒙细雨，寒风凛冽，我们徒步到浪坡集中，然后经香山、石冲、张黄、乌梅根到达金街。因为上山带着小孩不方便，把他寄养在农家，轻装上阵。经过几个月的游击生活，夜晚行军，栖山露宿，风吹雨淋，敌人烧山追击，奔跑羊肠小道，不怕苦不怕累，紧跟队伍前进。在大窝山战斗一役中，我亲身体会到遵守严格的纪律是胜利的保证。这次战斗牺牲了一些同志，后来组织上令我们撤退回原地。

1946年冬，华南形势紧张，组织通知我撤离合浦，我带着女孩到广州教书。同年夏天，爱人也离开合浦，转移到越南。1947年春，我在广州又生了个男孩，快满周岁，爱人奉命从越南返国，路经广州也没有找到我，便匆匆奉命返回合浦原籍。1949年春，我接到党组织通知，带儿女返回合浦。解放后，我分配在北海工作，开始在电厂当经理。1952年‘三反’时，被诬造贪污，挨了几个月的斗争，受尽折磨，后调到电影院，做了三年经理，1956年调到市妇联任副主任。在反地方主义中，我被划为地方主义份子，下放农场劳动三年。我爱人被划为地方主义头子，开除出革命队伍回家当农民。四个儿女的生活全靠我七十八元工资维持。

1961年，我爱人恢复工作，我也调到合浦电影院，不久又调到商业部门，安排我在旅社当服务员，后又分配在饭堂当总务，1964年我在饮食公司退休领70%工资。82年转为离休。我离开工作单位至今二十一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找不到一条适合的路子欢度晚年，四个儿女分配在各地工作，我住在合浦，生活是有点单调，早晚打太极拳，锻炼身体，日子就这么过去。

郑宗仁

在革命战争年代，从群众、战友到领导，很少人知道他的真名，都叫他郑七叔。

郑宗仁，现浦北县大成乡六鸣那陈坡村人，1923年11月出生在贫农家庭，全家靠租种地主的十余亩田，勉强维持生活。因家境贫困，他十多岁才能上学，断断续续读了三四年书，高小尚未结业。

抗战初期，合浦地下党先后派朱兰清、张世聪、何世权、李华良、岑月英、王克等一批党员骨干到白石水（大成）地区，开辟白石水游击根据地。他们的公开职业是白石水、金街、勾刀水、柑子根、红岭等小学的教师。郑宗仁在红岭小学读书时，在进步教师的启发和教育下，使他认识到劳动人民的苦难是旧的社会制度、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所带来的，对反动派不抱任何幻想；同时认识到毛主席和他所领导的共产党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领导人民翻身谋解放；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因此，党领导的白石水抗日武装自卫斗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了支持这一斗争的活动。41年8月，武装斗争停止后，在郑绍棠、郑广昌的指导下，与徐为辉等近十人组成秘密游击小组，开展有益的活动。

45年1月，郑宗仁参加了白石水（大成）武装起义。过后不久，陈明景在他家建立交通情报站，由他负责。他还和王朝明一起搞过地下印刷。翌年二月，经陈明景介绍他加入共产党，曾任交通情报站站长、武工队队长、武工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区中队指导员、白石水区委副书记。在此期间，他经常带领武工队活动于敌人的心脏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敌人也因此对他仇恨至极，除了不断“清剿”之外，还逼死了他母亲，几次把他父亲关进监狱，惨施暴刑，致成残废。而且强迫他家交钱交粮“悬红”，企图逼他放弃斗争、自首。这一切，使他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与同志们一起坚持艰苦斗争到解放。

家乡解放后，郑宗仁曾担任白石水乡乡长、区长，带领区中队随县长朱兰清到北通一带配合正规部队剿匪。剿匪结束后，他先后任过浦北县民政科长、合浦检察分院检察员、浦北县委组织部长等职。曾因揭发党内某些违法乱纪的现象，以及向当年地下党的领导陈明景、谭俊和陈华等同志反映革命老区的一些情况，而冒犯了某些人。后来“反地方主义”时，被诬陷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干，兼被划为右派分子，于58年7月1日遭到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的处分。此后，他被赶到乌家农场、湛江地区干部农场，劳动改造了三年多的时间。摘掉右派帽子后，分配他到合浦公馆、白沙供销社当采购、推销员十多年。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曾任合浦县民政局副局长、合浦县委老干部科科长、组织部副部长。现已离休。

钟古

钟古，原名钟喜权，1920年出生在合浦县南康镇粟山村的一个雇农家庭。他一家五口，主要靠父亲给地主打长工，母亲替别人做短工来维持半饥不饱的生活，每遇荒年时月，还得挖野菜充饥。有一年，天花流行，钟古和母亲都染上了，无钱医治，家中又无粮，父亲只好含泪把他姐姐卖给人家当丫头。他从九岁起就给地主看牛、干农活，十多岁才能进学校读书。

钟古先后就读于南康中心小学、合浦三中（今南康中学）、钦州师范等校。38年他读高小以后，在进步老师的影响和教育下，思想开始倾向进步，勤奋读书，各学科成绩优秀，被推选为班长和学生会主席。40年8月，他在合浦三中经李洵祥、李廷焕介绍入党。他曾通过学生会这一合法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一面团结教育同学，秘密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讨论政治时事，一面组织同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积极参加南康米案和声援白石水武装斗争，并在活动中培养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

钟古入党后，曾任三中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直至43年7月初中毕业为止。8月，上级党组织派钟古、陈均苑、冯训庠、陈铭淇等去钦州师范以读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由钟古任支部书记。44年11月间，日寇打通了湘桂线，钦县党组织调钟古任邕钦路西区工委，着手准备武装抗日工作。

45年2月7日，钟古参加了钦县党组织发动的小董起义。起义战斗失利后，队伍整编为两个中队，钟古任第一中队指导员。部队在钦北灵西被强敌打散后，与卢文、朱守刚等不幸被捕。经进步乡长黄瑞法营救保释出来，党组织又派他和钟淑坚一道往灵山、合浦联系上级党组织领导人。同年五月，钟古在遂（溪）、廉（江）地区任三团从连指导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遂廉地区活动的合灵部队奉命组建为合灵独立营开返原地坚持斗争，钟古任南康连副指导员。他和指导员陈符隆率领全连返南康，与当地坚持斗争的李洵祥等同志汇合后，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一面休整，一面发动群众，恢复老地区。

46年夏天，党组织派钟古到合北、灵东地区工作，他到小江时，适遇小江部队在新田麓受挫，大队长练炳强等十余人牺牲，未能接上关系，约一个月后又奉命返南康工作。同年秋冬间，南康、公馆、白沙等地的游击队合编为合东南游击大队，朱伟任大队长，李成任副大队长，钟古任政委，坚持在合东南和合博廉边活动。47年5月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团在公馆区东成乡吴家祠组建，钟古任二营教导员，后不久取消营建制，钟古调任团政治处组织股长。

47年9月钦廉四属党组织特派员陈华（兼管桂中南地区党的工作），为支援桂中南起义，派朱伟、钟古到江北地区分任十九团副团长、副政委。次年二月，钟古奉调返

白石水参加县团干部学习。八月，党组织派他任政治交通，前往十万山，向钦、防党组织传达边区党委的指示，在归途中于那彭被敌人逮捕。钟古被捕后，合浦党组织曾多方设法营救，但未达目的，直到49年底钦州解放时，钟古才出狱。

解放初，钟古任合灵征剿指挥部秘书，为平息匪乱，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贡献了力量。此后，钟古曾任合浦县青委书记、青年团合浦县委书记、合浦县农民工作总队政委、土改中队长、联区工委书记、法院院长、合浦地委宣传部科长、副部长、钦县县委第一书记、合浦地委农村部副部长等职。58年反地方主义时，钟古受撤职降级之处分，调往湛江地区任农业畜牧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文革”期间，被诬陷、迫害达八年之久。78年才得到平反，任湛江地区农业畜牧局局长、党组书记。84年7月离休。

钟景彰

钟景彰（又名钟仔），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生于合浦县南康菠萝根一贫农家。小时，家境极为艰难，常喝薯汤或木薯糊过日子。父母生下他们兄弟姐妹七人，因生活所迫，两个姐姐卖给地主做婢女，两个哥哥给别人打长工，另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因病伤无钱治疗而惨死。景彰排行第六，是个晚仔，父母比较疼爱，九岁时，家里省吃俭用送他入学读书。此时正值抗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遍及山隅海角，抗日救国的思想深深植根在他幼小的心灵上。进入雷田小学读书后，开始受党员教师陈符隆的影响。四一年进入南康中心校读高小，在南康镇先后与陈符隆、钟古党员负责人等一起居住，为党的领导人做通讯联络和放哨等工作，如饥似渴阅读《西行漫记》、《铁流》、《新华日报》、《社会发展史》等进步刊物，接受革命真理。四三年秋考入合浦三中初中，在陈符隆等党员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四四年秋因经济困难，被迫辍学。

四五年二月，党组织领导南康起义，景彰闻讯后，决心参加陈符隆领导革命的起义队伍，前去找寻起义后失散留下的陈普坤（后叛变）、姚德厚，参加他们的队伍。二月底，他们与李洵祥等为了夺取武装，并征得陈符隆及上级同意，组织了几十人打入安铺日伪军。景彰随队前往，后因形势变化，日伪不肯给枪支和给养，只好撤回。这几十人大部份当即到高雷游击区，加入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三团莫练营，钟任八连通讯员。后任合灵独立营南康连交通员。四五年九月，抗日胜利后不久随队回南康坚持艰苦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二月，由陈符隆、钟古介绍参加党。此后在南康地方活动，任南康武工队长，四七年五月编入二十四团，任八连政治指导员。四七年十月留下在合东南区搞地方工作，曾先后任南康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合东南工委委员，同时领导了南康地区有上万人参加的农会工作，对于打击反动势力、开辟新区和支前工作起了较大

的作用。

解放后，历任区委书记、县水电局长、副县长、县农办副主任、县人大副主任等职务，工作兢兢业业，常常公而忘私，为群众所称誉。在任水电局长和副县长期间，为修建合浦大、中型水库做了大量工作。

但在“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被诬为“叛徒”、“特务”、“汉奸”、“土匪”，被停职“监护”审查长达五年之久，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了折磨。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彻底平反。目前已经离休，但仍决心为革命发挥“余热”，协助把县的党史等工作做好。

姚宁泽

姚宁泽，参加革命后曾用名姚强，大家尊称他“亚公”。他1925年出生，合浦县南康镇扫管龙村人，因为家贫，九岁始能入学启蒙，后就读于南康中心小学、合浦三中（今南康中学）、合浦农校等校。

40年秋，姚宁泽考上初中后，在地下党员钟古等人的影响、教育下，开始向往革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经常秘密阅读《新华日报》等进步刊物，萌发了革命思想。44年秋，他失学回乡。同年冬，日寇占领了湘桂线，中共南路特委针对地处敌后和前线的形势，决定发动全面武装起义。在地下党员姚国厚的带动下，他满怀革命热忱参加了南康武装起义。起义队伍一举袭击粤南沿海警备大队机炮中队，获得成功后，迅即向白石水（大成）转移，先后同各地起义部队会合。他随队转战在合灵边、合博边、廉遂边等地区，曾任班长、分队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合灵地区在高雷的队伍奉命组建为合灵独立营，开返各地活动。姚宁泽随南康连自遂溪返南康，一直在南康、白沙、闸口、白龙等地坚持艰苦的游击斗争，为发展和巩固合东南区游击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在这期间，他曾任合东南游击大队的中队指导员、南康区中队指导员、南康区副区长等职。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姚宁泽曾任合浦县沿海工作委员会主任、沙田特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合浦县副县长兼渔业部长、浦北县副县长、钦州地区农业试验站党支部书记等职。

十年动乱期间，姚宁泽也惨受迫害，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受审查三年多，后又到干校“改造”了三年，73年才重返地区农业试验站工作，后来调任钦州农校校长、自治区水产局政治处副主任。姚宁泽现在是合浦县委顾问、政协主席。

符志行

他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事干部，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在海南岛，在南路，他指挥打了许多漂亮的歼灭战、防御战。他很早就和合浦的同志结下深厚的友谊……。

符志行，广东省海南岛儋县人，1920年五月十六日出生于儋县美迎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曾祖父是清朝的官吏，祖父是光绪年间的秀才。

1925年春，符志行的父亲不满社父的封建家长统治，挈家迁居那大镇。父亲失业，家贫如洗，母亲到乡下与地主賒谷回家加工出售，维持一家生活。他五岁上学，在基督教会办的灵光小学念书，因为家穷，每天借同学课本给父亲抄来学习，星期天，替外国人扫马路、割草挣钱买学习用品。

符志行的父亲曾在华美中学读书，在地下党影响下，参加了农民自卫军，1927年被捕入狱，后来儋县和临高党组织发动农军攻进县城新州，打开监狱，他父亲才被解放出来。后来就在教会办的福音医院学医，家里生活好过点。

1931年秋，在教会办的府城岭南大学分校附中念书，学费除了靠家庭供给外，部分由自己勤工俭学供给，还得到优等生助学金。他的学习成绩比较好，跳了一级，毕业成绩优良，于1936年秋被学校荐送岭南大学读书。

符志行在广州读书时，受中山大学海南同乡的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读书会和抗日活动。1937年秋，参加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

1938年秋，广州告急，抗先队总部组织一批青年去延安，符志行是其中一个，后因粤汉路不通，他被派回海南岛工作。他在琼崖特委领导下工作，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由陈石、李独清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段时间，他先后在那大地区做宣传工作，在琼崖游击队独立总队三大队担任政工队长，后又派回那大地区开辟根据地，担任大南区区委书记。

1940年冬，他认识张九匡同志，张是总队部派来这里开辟工作的，两人成为亲密的战友。1942年2月，他们两人调到四支队二大队，符志行任大队长，张九匡是政治委员。

符志行的父母亲先后出来参加革命，父亲是后方医院院长，母亲是在交通站任站长，为了组织武装，他说服家人，把家产卖了购买枪支。

值得称道的是1941年秋，国民党反动派施行诱降阴谋，逮捕符志行的母亲，向他提出释放的条件：去香港读完大学；任儋县县长，离开海南到大陆就业。只要答应一条就可以释放。符志行深知这是敌人阴谋，和张九匡等人商量，发表告乡亲父老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咀脸。

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失败，便将符志行的母亲杀害了。

1945年4月，第二大队改为远征队，归挺进支队指挥，进军五指山，捣国民党反动派在白沙县的老窠。45年秋，调任临高县副县长兼武装部长。

1946年夏天，他调到海南东区，任松江支队支队长；47年调任第三总队副总队长，建立五指山根据地，参加秋季攻势。

在这段时间，张九匡虽然牺牲了，但他和罗文洪、陈任生、李英敏这些同志一起并肩战斗，成为很好的战友。

1949年1月，海南区党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派遣符志行、莫逊等军政干部，到广东南路粤桂边纵队工作。同年2月，他担任粤桂边纵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在合浦等地战斗，著名的武利江歼灭战，就是他指挥的。

1949年冬，他调任粤桂边纵队前线总指挥，负责解放雷州半岛。湛江解放后，他任湛江警备司令。

1951年冬，他带领一个加强团三千多人到朝鲜前线，和美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战斗。1952年春天，他在东北接受苏联的探照灯团，担任团长。

从1952年夏到“文革”前，他先后到汉口防空学校高级军官深造班学习，后调北京高级防校工作，任系主任，后又调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任训练部长等职务。

“文革”期间，1967年7月，任国家体委副主任。1976年秋，调空一军工作。

现在已离休，定居北京。

符志行在海南和南路参加和指挥过的战斗很多，影响较大的有：

①1942年6月把总战斗。二大队刚建立，没有机枪，他带一个班在临高和舍把总桥伏击日寇，击毁敌军车一辆，毙伤敌7人，缴机枪一挺，步枪五支，手枪一支。

②1942年秋白南战斗；二大队在儋县络基乡白南岭伏击日寇。敌增援至7百多人，两架敌机配合反击，战斗从下午1点多打到4点多，击毙敌少将一名，毙伤敌70多人。符志行在作战中受重伤，由政委张九匡指挥撤退。

③1943年五月迈格战斗。在反“蚕食”斗争中，二大队奉命到外线活动牵制敌人。端午节那天，部队驻在迈格村，被日伪军1000多人包围，在敌机配合下进攻，二大队只有两个中队100多人，战斗从上午9点多打到晚，我军打退敌军十多次进攻，毙伤敌200多人，内指挥官一名，我军乘黑夜安全突击。敌人第二天还在攻击，打到下午才敢进村。这次战斗，符志行获得“抗日奖章”一枚。

④1946年春智取福昌据点。这是原日寇据点，地形险要，工事严密，易守难攻。符志行化装敌军131旅营长，带30多名战斗员，假装押送俘虏，到据点休息。他只凭一支手杖一口广州话，不费一枪一弹，全部俘虏敌军联防队正副主任以下官兵50多人。

⑤1949年4月张黄战斗。他指挥4支队用长途奔袭的办法，袭击张黄圩伪乡公所，全歼乡警10多人，缴枪10多支，并开仓济贫，战果虽然不大，但影响整个钦廉四属。

⑥1949年那丽战斗，全歼守敌联防队100多人，从此打开三那局面。

⑦1949年武利江战斗，干净彻底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加强营，缴获轻重机枪10多挺，步枪100多枝，震撼整个南路敌人营垒。

⑧1949年冬解放雷州半岛战役，歼敌1000多人。并配合4野43军，解放湛江市。

梁 干

梁干，原名梁帮多，曾用名过梁有道这个名字。灵山县人，1924年4月出生于灵山县新圩官屯村。

1944年以前，在家乡读书，在灵山简易师范毕业。受地下党同志的教育影响，1942年8月，经温之淮介绍，参加地下党组织，也即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学生中进行党的活动。1945年1月，参加灵山武装起义，党派他到梁振威部队，担任战士、政治战士、中队长。1945年8月至1947年7月，调到灵山游击队黄式高都，先后任政治服务员，副中队长，副大队长，代理大队长。1949年以前，任灵山18团副团长。1949年6月，调到合浦县新6团任副团长，后任粤桂边纵队4支队10团团团长，一直到解放。他始终在灵山、合浦这片土地上战斗，从一个战斗员成长为一个团的指挥员。

解放后到1953年7月，先后担任合浦县大队大队长，钦州军分区25团副参谋长，广西军区独立4团副参谋长，北海市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从1953年7月到1957年，调到广西平乐军分区，先后担任副科长、科长，贺县兵役局局长，天峨县武装部部长。

梁干虽在部队，也离开灵山合浦，但不能逃脱“左”的迫害，在1957年所谓反地方主义和反右派中，遭受迫害，被控制使用。1967年随支“左”人员到柳州专署工作3年，由于所谓南路党的问题，虽然挂名为柳州市武装部长，1969年以后，以所谓“叛嫌”遭受一系列审查迫害，直至四人帮垮台，才不了了之，但没有落实政策。

梁干同志现已离职休养。

黄 池 江

在合浦县北部山区（现属浦北县），在建党初期发展的农民党员，能坚持到解放的，为数不多，黄池江是其中之一。

黄池江，号八叔，又名黄云甫，合浦县（今浦北县）大成乡平山坡村人。1913年旧历正月生于白石水乡佛子塘村。1922年至1925年，读了三年私塾，以后在家种田，还替地主打短工维持生活。

1938年秋，张世聪、朱兰清回到大成，开展抗日活动，黄池江参加了夜学、识字班，受到革命影响，1939年旧历5月，经岑月英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黄池江参加党以后，工作很积极，经过支部安排，他在勾刀水东馆小学当炊事员，

实际上他是白石水中心区委的交通员。这个人具备农民的特点，不声不响，埋头苦干，他先后被选为勾刀水支部委员、白石水中心区委委员。

1940年5月，白石水武装斗争开始后，他负责农民武装的后勤工作，送饭送水，交通联络，工作是不大显眼的，但非常积极，在枪林弹雨中，他表现很沉着勇敢。

1942年，武装斗争被迫停止后，他回家当农民，因为他不是什么出名人物，能够隐蔽下来。在这几年艰苦岁月里，他曾一度和组织失掉联系，但很快就恢复了，在陈明景同志领导下，继续做地下党的秘密工作。

1945年初，他参加了武装起义，张世聪带队伍回来后，他参加了部队，担任交通情报工作。张世聪同志牺牲后，他在合灵地区，担任交通联络情报工作，以后担任后方经济税收工作。

全国解放后，他担任白石水粮仓主任，后来调任寨圩兰门粮仓主任。1954年冬到1957年春，领导让他到北海干校学习文化。1957年到1961年，他担任北通锅厂支部书记，1962年调到白石水铁厂，任副厂长。

1971年办理退休手续（后改为离休），回到大成平山坡村，过田园生活。

他感到工资低(20级)，家庭负担重，八婆没有收入，年老不能劳动，孩子外出工作，也没法照顾他们。

黄其江

黄其江是广东省遂溪县城月区平衡乡人，1914年6月出生，九岁入学，先后就读于遂溪第二高小、雷州师范、广州广雅中学、江村师范等校。

38年6月，黄其江在江村师范经刘秉钧介绍入党后，受省委的派遣回遂溪工作，通过“青抗”活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39年遂溪县工委建立，黄其江任书记。

黄其江，曾用名黄香生，化名“四叔”。他曾在合浦工作过两个时期，第一次是40年春至42年秋，任合浦中心县委书记。第二次是48年8月至年底，任粤桂南工委书记。

40年春，南路特委派黄其江来合浦工作。不久，合浦县工委在白石水东馆小学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党中央关于“三坚持、三反对”的政治方针，并结合实际布置各区党组织开展反汪反逆流运米资敌的群众运动；同时，撤销县工委，恢复合浦中心县委，由黄其江任书记，谢祖祐、朱明分别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

其时，合浦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汪反逆流反奸商运来资敌的斗争，史称“合浦米案”。五月间，中心县委书记黄其江在小江接到情报：国民党当局即将派兵镇压爱国抗日反汪的白石水（大成）人民群众。他赶到白石水，立即与区委书记何世权以及区委成员一起，研究对策，决定武装自卫，由此爆发了历史著名的白石水人民抗日武装自卫斗争。

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白石水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战，连续三次粉碎了数倍甚至十倍的敌人的军事“围剿”与和谈阴谋，异常艰苦地坚持斗争了一年又四个月，名扬钦廉四属、整个南路地区以至两广。后来，省委的主要领导主观片面地下令，把白石水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合浦中心县委只好执行上级的指示，决定把直接领导这场斗争的何世权、张世聪、王克、卢文撤离白石水，解散武装骨干队伍，埋藏武器，妥善进行“转变”，黄其江到白石水传达上级指示、县委的决定和布置善后工作。就这样，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被迫停止了下來。此后，敌人大搞清乡扫荡，白石水人民惨遭摧残。

这件事，黄其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他“太积极”了。

42年10月，黄其江因病调离合浦。46年初，他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直至47年秋才重返南路工作。

48年8月，粤桂边区党委决定撤销原钦廉四属工委，分设粤桂南工委和十万山工委。粤桂南工委在合浦县多蕉乡冲堀垌小学（今属常乐镇中直村）宣布成立，黄其江任书记，沈英汉、陈华任副书记，黄明德、张进煊、谭俊等为委员。当时，黄、沈还率领邹贞业、周霖等三十余名干部到合浦工作，对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黄其江还曾任粤桂边地委、区党委和南路地委的组织部长。解放后，他历任高雷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高雷专署副专员，华南分局组织部处长，广东省监委秘书长，广东省委工业部副部长兼第三书记，湛江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广东省高教局副局长等职。

黄福隆

黄福隆，又名黄老福，原属合浦县（现属浦北）小江乡屋背村人，1923年出生于小江。

1934年至1943年，先后在合浦县第十二区小学和合浦正成中学读书，接受革命教育影响，1940年下半年，在正成中学读书、担任学生会主席时，由地下党负责人宁业富同志领导布置他在学生中进行工作，多次领导同学造反，反对学校反动措施，1943年被学校开除，小江伪乡政府准备逮捕他，由宁业富、冯日升安排他到灵山县佛子小学教书，和该校地下党员李世益一起工作和学习。1945年2月，小江起义前，由小江党组织通知他回小江，参加武装起义。1947年12月，由宁业富、冯彪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小江武装起义后，他在小江游击队里先后任排长、文化教员、营部副官。1948年2月至解放，担任小江区武工队队长、支部书记。

解放后，先后担任小江征粮队队长、福旺乡乡长、党支书，福旺区委书记，龙门区委书记，官垌区委书记。1954年3月，任浦北县委委员、副县长、统战部长。1958年下半年，被诬为地方主义者，被降职使用，调到茂名市工作，担任郊区金塘公社副社长，1962年以后，先后担任过茂名郊区农业局副局长，市水电局科长，市企业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黄福隆的地方主义问题，算是平反了，政策未够落实。目前，他已退出第一线，但仍在工作。

蒙英翰

蒙英翰，原籍灵山县人，1919年1月出生在灵山县丰塘乡修竹村，农民家庭。

1938年在浦北寨圩读简易师范初中时，受到卢璧光、陈业昌等人影响，参加革命活动，1938年11月，经陈业昌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浦北、也是灵山最早一批党员，特别是对灵山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蒙英翰参加党以后，进步比较快，在推动影响同学走向革命，做了不少工作。1939年，他担任寨圩中学党支部书记，1940年，寨圩成立党的区委会时，他担任宣传委员，对发展寨圩党组织，开展抗日活动，蒙英翰是有贡献的。

为了开辟灵山县的工作，1941年，合浦县中心县委把他派到灵山，他先后在那东小学、大远堂小学当教师，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组织抗日自卫武装；1945年初，他参加灵山武装起义，担任起义的灵山大队的中队指导员，1947年担任灵山灵东大队的大队长，1948年担任十八团的团长，这是一场艰难残酷的战斗，特别是灵山的同志和合浦的同志一起，合编合灵大队，在西征中牺牲损失很大，回到灵山后，大伙毫不动摇坚持下来，并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团队，蒙英翰是其中的一个。

在1949年9月至1950年5月，蒙英翰担任粤桂边纵队第4支队12团团长的，为解放灵山、合浦贡献了力量。

解放后，蒙英翰担任中共灵山县委统战部长，农民协会主席，1954年调到合浦专区供销社任主任，1958年被诬为地方主义骨干，被撤职开除党籍，调到茂名石油公司当一般干部使用，直到1978年平反，恢复党籍和副处长一级干部，1983年办理离休。

蒙英翰的弟弟蒙英经，1945年在沙塘水战斗中牺牲，1946年，父亲蒙保轩也惨遭国民党杀害，只有母亲躲在亲戚家，解放后跟他过日子。

蔡琳

蔡琳是参加著名的白石水武装斗争的女同志之一。她原籍是广东省海南岛琼山县，父母早年侨居越南，她于1921年在海防出生，36年初中毕业后，双亲相继去世。她目

睹了法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加上进步思潮的影响，逐步树立起强烈的阶级爱憎感，一心向往革命。抗战爆发后，她和几位同学毅然离家归国，准备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后几经周折，才摆脱了家庭的控制，取道香港回到了广州，时已38年夏天。

蔡琳经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批准，正准备以归国华侨考察团成员的身份北上去延安抗大的时候，日寇进逼广州，粤汉铁路交通中断，她无法成行，就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青年先锋队。她恰好与前往广州受训的合浦一中进步学生罗永璞、黄翠玉同在一个分队，她们沿西江而上至罗定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过后不久，抗先队为国民党顽固派所扼杀，她们又一起回到北海。当时，日寇已占领了涠洲岛，廉中迁到小江，合浦一中分别迁到廉州西郊大石屯和小江长塘山，北海地下党安排蔡琳以归侨身份到一中长塘山分校就读。分校以延安“抗大”校歌为校歌，并带去了一批进步书刊，既便利了师生学习之需，又为开展农村宣传教育提供了条件。蔡琳在长塘山分校期间，积极参加分校地下党所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如演剧、办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等，通过这些活动，有意识地宣传革命道理和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从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廉中、一中分校党组织经过艰苦的努力，在小江镇及其附近先后发展了四五十名党员，建立了八九个支部，39年秋还建立了小江区委，为后来的斗争培养了一批骨干。蔡琳在救亡运动中，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更加迫切要求参加党组织。

1939年夏天，党组织安排蔡琳到福旺以家庭教师为公开职业作掩护，继续开展地下工作。同年秋，经何醒予和卢冠群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

为了加强以白石水为中心的农村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从39年秋开始，中共合浦地下党陆续调集二三十名党员骨干到白石水工作。40年初，蔡琳奉调到张世聪的家乡勾刀水村，在东馆小学当教师。这个学校有地下党的一个支部，成员是张世聪、岑月英、罗德崇、蔡琳、张世柏、张世瑶，书记由区委委员岑月英兼任。他们同其他几个支部一样以学校为基地，广泛开展农民工作。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办夜学、教识字、教唱歌、讲革命道理和打日本鬼的故事，寓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和方针于其中，提高群众的觉悟。经过一年多的艰辛努力，培养和发展了数十名出身贫苦的农民入党，壮大了全区党组织的力量。

自从日寇侵占涠洲岛并在钦州湾登陆后，国民党反动派不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而且与奸商相勾结，在合浦各圩镇抢购粮食和其他战略物资运往涠洲资敌，造成粮价暴涨，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强烈要求制止运米资敌。南路特委、合浦中心县委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决定把反汪反逆流的政治斗争，同要求降低米价、禁止运米资敌的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于是，白石水区委发动和组织了白石水请愿斗争，二三千群众包围乡公所，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禁止垄断市场，平抑物价，禁止奸商资

敌。可是，国民党合浦县当局却要派兵镇压群众。白石水区委被迫以“团练”形式，发动和组织群众武装起来进行自卫反击，白石水抗日武装自卫斗争就这样爆发了。蔡琳参加了这场斗争，并在斗争中锻炼得更成熟、更坚强了。

40年6月初，敌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伪县长李本清率敌千余分几路进攻白石水根据地。我方各村螺角齐鸣，武装起来的群众纷纷登山迎敌。在东馆小学的蔡琳和罗德崇，因组织学生疏散、收拾东西，行动迟缓些被敌人捉住关在学校里。区委集合了一二千武装农民包围了盘踞在东馆小学的敌人。在我方的政治、军事攻势下，敌人被迫释放蔡、罗两位教师以后，夺路而逃。

白石水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之后，蔡琳被调到小江，经党组织批准，她与何国达同志组成了小家庭，夫妻俩按党组织的安排转移到合博边的那林，建立秘密交通站，担负起合浦中心县委与特委的交通联络任务，直至42年为止。

后来，蔡琳和何国达又按照党的布置，打入钦县伪县府任职，为党组织搜集情报。45年2月初小董起义失败后，他们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被迫于同年底分别转移到其他地方。

49年夏秋间，中共合东南工委布置何国达、蔡琳等同志组织情报组，刺探敌情，并设法储备粮食，准备迎接大军解放北海。

解放后，蔡琳一直从事财会工作，她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从未出过差错，深受群众好评。84年冬，上级党组织给她恢复了39年入党的党籍与工龄。

蔡 维 中

抗日战争时期，合浦地下党的几位党员在开明人士办的小江印刷厂，秘密地为党组织印刷了一批又一批的重要文件、革命传单，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革命斗争，鼓舞了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斗志，震惊了敌人。这里介绍的是地下党员、当年的印刷工人蔡维中同志。

蔡维中是合浦县常乐镇皇后村人，1918年出生于贫穷之家。他七岁那年，父母双亡，靠兄长抚养，就读于本村私立小学，高小毕业就失学了。

1932年，刚满十四岁的蔡维中离家到北海谋生，先在北海书店做学徒工，继而入新新印务局当排字工人。时逢合浦、北海的学生运动蓬勃初兴，廉中、一中等校进步学生秘密组织读书会，编辑出版进步刊物，举办平民夜校，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唤起民众抗日热忱。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蔡维中开始追求进步，热情参加承印北海进步青年、学生编辑的《缪丝》、《大风》、《战声》等报刊，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

1938年秋，日寇的铁蹄伸进涠洲岛，北海进行大疏散。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动

员新新印务局的经理、开明人士陈锡汉把印刷厂搬迁到灵山，联合当地进步力量出版《灵山日报》，蔡维中随厂迁移，积极工作，为我党占领这一宣传阵地作出了努力。

1939年6月，蔡维中由何国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日寇打通了邕钦线，进逼灵山。合浦县工委再次动员和帮助陈锡汉把印刷厂转移到小江镇圩头山潘屋。该厂党员何国达、蔡维中、张其奎及包德彰等同志夜以继日地战斗，秘密地为合浦地下党印刷了大量的文件、书籍，包括夜校课本、马列著作、革命传单等，推动了地下斗争的开展。如40年4月间，他们印刷了毛泽东同志亲笔为延安民众反汪大会起草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及八路军通电《告全国人民书》等传单，在全县各地以至毗邻的钦、防、灵、博等县散发后，更加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倒退、分裂的罪行，深刻教育了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坚持武装抗日。印刷厂内建立中共党支部，由何国达、蔡维中等组成，是合浦地下党的一个重要秘密联络点。合浦县工委（后为中心县委）的领导多次在此召开重要会议；中共钦县特别支部在这里成立并接受上级赋予的重任；一批批南来北往的同志由此中转。为此，何国达、蔡维中等同志一方面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陈锡汉，何娥英等对革命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他们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给领导和同志们解决食宿，同时做好安全转送工作。

1941年秋，白石水武装自卫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后，合浦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党组织决定在印刷厂工作的党员撤退隐蔽。他们在帮助张世聪等同志安全转移后，分批撤离了小江。蔡维中转移到博白那林一带，时值斗争处于低潮，环境条件恶劣，他与何四妈（何国达母亲）一面做党内交通员，一面以何四妈变卖衣物所得为本钱经营一些小生意，赚点微利维持同志们的艰苦生活，共度艰难的岁月。

1944年初，蔡维中按照党组织的指示，转移到灵山县平山乡凌家小学，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斗争。同年秋至次年，他又奉命先后打进灵山、钦县伪政权，协助党员黄文法、何国达搞情报工作。钦廉四属武装起义时，钦县党组织负责人卢文指示何国达、蔡维中不参加起义，继续留在伪政权内搜集敌人的情报。小董起义失败后，何、蔡两人同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被迫于46年春转移到越南海防，公开的身份是公昌行的店员，他们负责接待、掩护由华南分局与滇桂黔边纵队之间来往的同志，并克服种种困难筹措药品和物资支援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49年夏天，蔡维中和何国达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北海，专事搜集国民党军、政、警、特的活动情报，为解放和接管北海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合浦、北海解放后，蔡维中历任北海电力厂军代表、北海市总工会筹委秘书（办公室主任）、财务部长、桂南染织厂经理（县级）、中共北海市委统战部主办干事，还一度在市计委、建委主管基本建设工作，现任政协北海市第三属委员会常委、政协党支部副书记。83年以来，参加市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工作，为落实党的干

部政策，平反全市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贡献了力量。

蔡维中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忠心炯炯地为党工作。解放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他被诬陷为“共产主义‘左翼联盟’反革命集团”成员、“叛徒”、“特务”，被开除党籍二十余年。1980年，党组织给他彻底平反，后又给予恢复了他39年入党的党籍。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蔡维中年过六旬，但他决心积极发挥余热，为北海市的经济开发和腾飞作出新的贡献。

廖世津

我们这里介绍一位在艰苦斗争岁月中幸存的革命者——廖十八佬（廖世津）。

十八佬，乍一听这个名字，以为他兄弟姐妹满堂，而实际上呢，他是父母的独生子，这个名字是为了造成敌方的错觉而安的。

1914年农历12月6日，廖世津出生于合浦县白沙乡龙颈村一个佃农家庭，十五岁才开始读私塾，继而在白沙小学读到高小毕业。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说起他参加革命的经历，是颇为有趣的。

那时候，廖世津根本不懂什么叫做革命，由于他与张九匡的胞弟九秀是同学，来往得多，自然也同张九匡玩熟了。当然，他并不知道张九匡是革命者，只觉得九匡是个好人，很知心，倾得来，后来九匡在公馆中学当图书管理员，失学了的廖世津，每逢趁圩都去找九匡借书看，九匡就有意识地向他推荐革命书籍，并给他讲些革命道理，后通过到龙颈村进行革命活动的张书坚，要求他召集村里的年轻人办夜校，廖世津答应了。没有经费怎么办？他就同伙伴们利用上山看牛之机砍柴卖，得些小钱，才办起简陋的夜校。此后，世津又动员大家集资办一个小型的合作社，经营一些日用小商品，赚点钱作为夜校的活动经费。讲课的老师就是邹贞业、徐永源、张书坚等人，通过老师授课和教唱革命歌曲等，世津既提高了文化知识，又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

1939年，廖世津参加公馆东三团的抗日先锋队，进行抗日救国、抵制日货的宣传工作，以及进行军事训练。是年，经廖上智、张书坚介绍，廖世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乡村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例如，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在夜间把《八路军通电》贴到乡公所的门口，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使敌人震惊，使人民受到鼓舞。

他的活动引起了敌人注意，他的名字被列入通缉名册，于是便改名为廖十八佬。

1942年，根据上级党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决定，革命队伍中有的人去教书，有的人去经商。十八佬和朱八根据谭俊的指示离家出外打短工。临行，父母、妻子流着泪嘱咐十八佬。要为穷人谋解放，不要惦记家里。

起初，十八佬和朱八去两广交界的冻塘当伙夫，后来回到白沙的椎木根、破岭村、

榄子根等地替人家煮盐，靠“千滴汗水一粒盐”的最低报酬，谋求生路，继续做革命工作。

1945年初，谭俊传达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十八佬在村内筹集到两支长枪一支短枪，同十几二十个手执大刀三叉等简陋武器的人一起，由白沙步行到金街(今属浦北县)集结。

1945年2月7日，白石水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了。任分队长的十八佬，作为突击队员参加了攻打白石水乡公所、马兰谷仓和西瓜地等几次战斗，他与周洪英、廖上能等人用斧头奋力砸门，首先攻入敌人据点。

几天后，敌人派重兵围攻我起义部队。在一次战斗中，他那位任副中队长的叔叔廖上智不幸牺牲了。他随部队撤到被视为司令部屏障的金街大岭。当天晚上，他们突然发现敌人摸上岭顶，开枪猛打，我方抵抗不及。十八佬和钟高镇一齐滚下山谷，倒在勒竹丛中，得以逃脱险境，但也同部队失去联络。他俩人地两生，只好在密林中躲藏，有时爬上岭顶观察方向，敌人的流弹又满天飞，故又退到岭脚隐蔽，二、三天内粒米未进，只靠野果充饥。到了第四天，他俩躲在密密麻麻的树丛中，听到有人走动，声音越来越近。他们冷不防把来人拌倒，原来是本分队的战士郑大海，是专门来寻找失散人员的。就这样，十八佬和钟高镇重新回到自己的队伍。……

解放后，十八佬任白沙区委书记、区长，一九五三年任合浦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几个月后调任梧州市手工业局党委书记，六三年起任公馆化肥厂党委书记。他在这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中，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可是以上这段生死之路，至今仍记忆犹新。

黎 团

黎团，原名黎传团。1920年9月29日出生于合浦县寨圩乡良水村一个富裕的自耕农大家庭，除了种田，还做蓝靛生意，生活充裕。但因人口增多，家庭逐渐衰落，抗战时期，只靠卖田地维持。父亲是桂林政法学堂毕业，没有做官，回来管家务，有些新思想，但死得太早了。

10岁以前，在本村读私塾，10至13岁读乐民凤池小学，后转到寨圩高小就读，1935年考入寨圩简易师范学校简师班。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是个抗日积极分子，1938年冬，教师黄燕帆（即黄平，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看中他，培养教育他入党，1939年初，学期开始时，由黄燕帆介绍，陈业昌接收入党。

入党不久，便到张黄参加合浦县青年代表大会，寨圩方面还有陈业昌、曾庆彪和其他两个青年参加，得到不少教益。

1939年秋，他在简师班毕业，调到中心校当教员，后调到初二小任教。

1940年4、5月间，米价飞涨，人民叫苦，曾庆彪（已是支书）通知党员，组织群

众请愿，伪乡长不答应群众要求，一些学生冲进办公室，砸烂一些家具。事后学校校长黎寿峰告诉他，反动乡公所已注意他，反动乡长扬言要捉人。

1940年10月，寨圩中学（简师改的）开展一场反对学校当局压制进步学生斗争，他声援帮助这场斗争。结果有13个进步学生被开除，覃炳璋校长也被迫离校。

这年11月，他得到党组织传达，国民党已掀起反共逆流，要做好应变准备。当时党组织让他办个训练班，把13位被开除的同学组织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提高大家的斗争信心。后来领导决定成立土西支部，上级指定他担任支部书记。

寨圩当时是个边远山区，组织基础薄弱，组织变动多，人员来往多，许多老同志如卢璧光、陈业昌、黄燕帆等都先后离开了，也有不少新同志调来这里，如岑嘉毅、何国达、劳锦、温科、姚政等，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安置他们工作和生活，但这些同志在这里时间也不长久。1941年4月，他曾带领唐才猷、劳锦到土东乡一个山村隐蔽，后来没事才回来。

1942年春节后，曾庆彪来通知他，说组织决定他到桂林读书，曾庆彪也去，他们先后到桂林、南宁和广东坪石读书。在读书时间，党关系没法转去，他多次回乡找党组织负责人劳锦，黎中昌请示，都得不到解决。解放后整党，把他42年到48年这段历史，当作自动脱党，真是岂有此理。黎团也因日寇进犯，读书不成，回到家乡。

1944年冬，区委书记劳锦在寨圩布置武装起义，黎团主动要求参加。劳锦布置他具体任务，后来不知为什么，当参加武装起义人员集中，突然宣布不搞了，劳锦自己也跑到南宁去了。后来寨圩归灵山领导，许多问题更难解决。1946年合浦县委派陈符隆来主持工作，着手整顿组织，黎团也填了登记表，不久，陈符隆离开了，来不及解决问题。

1948年寨圩又归灵山领导，灵山游击队经常住在他家乡一带，党组织负责人蒙英翰也长期住在他家里。作为一个党员，他大力支援游击队，积极参加党的工作，他和同志前后输送四批青年参军，人数最多一批有800多人。

1949年12月，寨圩、灵山先后解放。黎团随着解放军进城，参加接收工作，担任合北特区区长。寨圩归还合浦后，任小江区副区长，后又任区长，这样起起落落了三次，54年任钦州县委秘书，55年调陆屋中学任校长，后调到钦州农校任校长，一直干了28年。

多少年来，为了42年到48年这段历史（即是作脱党论，不算党龄），给他背个沉重的政治包袱，每个运动都是被整的对象，特别是十年动乱中，各种帽子都有，轮番批斗了一百多次，各种苦役都尝过了，革命有罪，人妖颠倒，所幸还能活下来，强加的罪名成立不了。1982年。黎团已退居二线，当所谓顾问了。

（根据本人自传改写）